

把客家地区历史文献、文化遗产记录整合出版,有利于对客家整体历史的研究。

客家文献的里程碑

■李春龙、王红星

作为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重大项目,《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是第一套客家族谱汇编。该项目由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教授和广东人民出版社首席编辑钟菱主编。

该项目是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实施的重大出版工程《世界客家文库》的重点项目之一,收录福建、江西、广东、台湾、四川、浙江等地区明清至民国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客家谱牒凡67种,涉及54个家族,36个姓氏,共100卷。收录的族谱均是未公开过的第一手珍贵文献,既注重地域与姓氏的代表性,也注重反映两岸同胞的同根同源。

该项目的成书出版有以下意义。

第一,鲜明的学术研究价值。客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世界上一直是作为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等诸多跨学科研究的重点。美国哈佛大学及日、法、韩等国的著名大学,均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谱牒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家谱对移民史研究、历史人口研究、社会史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客家珍稀谱牒对于研究客家人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华南及其周边区域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融合,对于闽粤赣川台地区的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等研究,都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第二,重要的现实意义。客家谱牒是证明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客家与内地客家同根同源的重要历史文献。因此,系统地广泛地收集、整理、编纂和出

版客家谱牒文献,有助于凝聚中国港台和海外客家裔孙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而整理出版客家珍稀族谱,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提升海外客家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亲情感和向心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三,重要的历史文献保存价值。随着社会变迁,许多谱牒文献大多遭到损毁;不少家谱是孤本,亟待抢救;然而迄今为止,客家地区的谱牒文献,一直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随着赣南、闽西和粤东北等客家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内外学者赴此地区从事田野作业的越来越多,原先主要保存在民间的珍稀谱牒文献更是纷纷流失海外。葛剑雄教授说:“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使这份珍贵遗产和重要的史料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是学术界同仁的一项紧迫任务。”《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100卷)的出版,使一批重要族谱文献得以抢救,为子孙后代保留了一笔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财富。

《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特别注意客家谱牒收录甄选的明确性与珍稀性,原则上坚持“断自可知”,以血缘关系确有可考察为限。其原则除了已出版的不收,网上可下载的不收,底本模糊不清的不收,非客家的不收外,还非常注意迁徙源流不清楚的不收,谱牒疑伪的不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说:“从明清以降的谱系承袭讲过来,庶几接近信史。”

除此之外,谱牒文化对了解

中国历史的真相,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色,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谱牒文献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谱牒文化是伴随着氏族制度而兴起的,可谓源远流长。在周代就有专职人员掌管谱牒。这为史家修史提供了珍稀的第一手资料。魏晋南北朝,门阀势盛,形成名门望族。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修谱牒的坠绪,自为家传、兴修谱牒,用意不仅在保有其地位和势力,其苦心更在传承优美家风、保存文化血脉、增进同宗同源的认同。唐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世家大族陵夷;五代之后,门阀士大夫殆尽。兵燹之后,家谱无存。两宋以后,文人修家谱,蔚然成风。民间社会亦闻风而起。当然,在修谱的过程中,家自为书,人自为说,也出现了鱼目混珠的现象。子孙失海外。也有过誉其先人的,其中是非曲直与国史记载出入甚大,也有伪托圣贤的,也有窃取家谱的,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以伪乱真,于是支离破碎,徒为有识者喷饭。但是为了认识历史真相,不能因噎废食,否认谱牒的历史价值。固然家谱的记载、私家著述容易流于诬枉,传统的官修史书也有讳饰的毛病。研究者考查事件的本末,若能对官书和私著史料等量齐观,“明辨之”“慎取之”,就有利于了解历史的真相,尽可能地避免诬讳的过失。

谱牒文化有利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色。

其一,伦理本位的责任意识。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观念认为:祖宗、己身与子孙互有责任,而联系祖宗、己身及族人最迫切的事就是修纂族谱。后世子弟虽亲疏不同,但做谱的意义是

让同家族的人观谱油然而生孝悌之心。“世泽不张,子孙之罪”,正是这种责任意识的体现。

其二,耕读传家的乡土理念。“耕读传家,书香启后”是乡土社会的理念。耕读对于中国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积累和精神文明的开展有着双重作用。克勤克俭的家训,追念和发扬先人艰苦立业的精神,对于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这对传统中国人格的塑造有基础性作用。家谱中共同体现了对“敦伦睦族”“克勤克俭”“热心济世”“行善流芳”等价值观的认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坚实基础。

其三,家国互动的治理模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以孝治天下”是我们古代社会政治治理的优良传统。人重视孝悌,一方面则可以忠于国家、福泽百姓,正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另一方面对于乡村治理、邻里与宗族的和睦大有裨益。《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多处记载对于不孝不悌、道德败坏的行为,基本的处理模式是由族长和各房掌事的人查原委,会议训斥,给予警戒。这有利于乡村矛盾的解决,简化和分担了国家行政管理事务,降低行政运营成本。乡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化运作,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形成家国之间的良性互动。

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走向不是“本位文化”,更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一个特征,在文化上表现为弘扬现代社会本位的伦理道德。谱牒文化在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中是不可多得的资源,是可以成为促进、丰富现代化的力量。

其一,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

体意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家人”,“天下为公”是中国文化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人一身,经过数百年香火的延续,瓜瓞绵绵,衍为成百上千过万的人,这成百上千过万的人,犹如一人的化身。虽然子孙星散四方,各居一地。但是人同一天,姓同一族。北宋大儒程子说:收宗族,厚风俗,使人心不忘本,须急明谱系也。谱牒一方面明晰了生命之根和血脉源流,有利于增进同姓之谊,另一方面同族之间疾苦同恤、困难互助,生发恻隐之心,以爱维系关系,增进福利。这是把社会关系家庭化,以伦理组织社会,也是天下一家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殊与落地。

其二,生生不息的修品敦伦精神。传统家谱功能具有“尊祖”“敬宗”“睦族”“避免同姓通婚”“选择官员”“爱重门第”“选择婚姻”等意义,今天看来有思想糟粕,也有文化精华。其精华部分滋养着我们敦伦报本的人生观,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社会风气,也是婚姻上自律自爱自尊、重视修品努力事功、培养自我责任意识很好的思想文化养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有一些新的意义,如培养优生意识,增进个人道德修养,补助人类遗传学研究,增强史学的精细化研究。因此,潘光旦先生认为“家庭制度存在一日,家谱也就一日不废”。谱牒中祖宗的“貽厥孙谋,慎厥德”的道德意识与子孙的“人虽已往,典型弥芳”的追远意识打破时空,形成一种冥会互照,生命意识得到一种契合,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其三,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互动。《客家珍稀谱牒丛刊》多处记载针对公共财产,对六十



《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陈支平、钟菱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定价49800.00元(全100卷)

及百岁都有不同的分配规定,对娶妻、添丁、丧葬、升学都给予奖励,鼓励上进,有着温情脉脉的家族乡情观。中国人认为人本乎族,“先祖者,类之本也”,有浓厚的敬祖观、礼仪观。“祭,如在”,良心在祭祀祖宗中、在家庭中得到训练,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钱穆先生说: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道教”或“良心教”……西方人以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人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三代不修谱,子孙不识祖”,谱牒是家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积累。此外,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谱牒文化的慎终追远性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谱牒文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教文化心理。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避免宗族社会本身的弊端,比如重男轻女、家长作风、任人唯亲等。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谱牒中有些思想糟粕消弭,有些思想精华还需要弘扬。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谱牒文化中有丰富的社会本位的伦理道德思维,可以转化为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助力之一。

无论是禁海,还是开海,闽商走四方的传奇故事始终续写。

明清月港周围人们的环境适应与生计谋求

■王日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仅表现在其层累性,所谓村社制残余、奴隶制残余均程度不同地延续下来,而且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是也。

一、农业曾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

农业曾经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引导中国社会不断成长为广土众民的国家形态。秦国起自西北黄土高原,铁制农具的发明与推广、灌溉技术的提升与普及带给秦国“原田每每”的盎然生机,是秦国统一了诸侯列国而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示范意义是巨大的,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既是宏大的理想,也一定程度上在有为的统治者那里变成了现实。

在农业文明观念的主导下,森林被砍伐,河湖海滨被围垦,农业区域的扩展就意味着文明的不断推进,变成土地的地方就成为人们生计之所赖,唯有土地出产才堪称财富。反之,就被定义为穷山恶水,也多千里而无人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往往奠基于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之上。

但是,单位社会的自给自足状态往往被更广阔的外部因素所冲破,自然环境的差异本能地导致物产的不同和交易的必要,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向来就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驱动力,所谓“农工商虞”缺一不可。

商品经济交易半径的扩大往往伴随着婚姻缔结的外延、行政区划的扩大乃至军事征服的推进等等因素而扩大,所谓“国界、省界、陆界、海界只是交易活动规模

化之后才日益明朗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无农不稳”的意识被动摇了。以己所有易人所有自然促成了物资的流通和人们生计的多样化。

本来被称为瘠壤的地方可以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山地林木可以商业化,山地矿藏可以商业化,各类山珍也可以商业化,交易这些东西就能维持生计,人们自然可以涌向山地,开辟自己的家园。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而言,他们又何尝不可以“以海为田”,开发海产鱼盐,行舟于海上开展贸易乃至侨居海外,另辟家园?

明清政府在海洋管理政策上屡有反复,对月港周围人们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地处九龙江入海口,月港周围的人们曾主动改造自然,面对“高者苦旱,低者病卤”的现实,他们修筑人工水道及数十道沟渠,排泄洪潦,发展农业。沿海的人们则从事蛏蚶螺蛳等海鲜的采摘,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基本生活。

宋代以来的筑海造田,使宽广的海湾逐渐变得狭窄,形成了南、中、北三港。农业的优先发展曾经长期主宰着沿海居民的生计,海洋贸易活动则是在农业和渔业活动之外对海洋资源利用的拓展,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二、世界性航海贸易逐渐引导沿海居民展足海洋

早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对抗其政敌方国珍、张士诚,曾经下令将方、张二人所属的兵民内迁,并且同时将兰秀山美元田粮的老百姓都充当船户,编入卫所,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己巳,朱元璋更是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尽管管如此,月港周围地方官员和普

通百姓却逐渐养成了嗜利忘禁的习惯,到景泰四年(1453),漳州知府谢萼发现“民多货番为盗”,他想强化对沿海民众的编甲管理,规定船只下海必须当日回来,并推行连坐制度,但是,民众总是能找到官方控制的薄弱环节,甚至有胆大到不但私自下海,而且敢在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当地国王的。更可叹的是行走于海上波海之间的船夫们都依托着或有钱或有势的豪门巨室。面对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许多势官宦富把持不住,有的甚至愿舍官而从商。当然也有矢志忠君者如张绅在奉调两江顺道回家时阻止族人私造巨舶冒禁下海的,他责令族人将造好的大船付之一炬,张绅的行为赢得了官府的夸赞,却从此阻断了自己返乡的路。

尝到甜头的下海者给了观望者成功的激励,于是从月港码头出发,到九龙江入海口的海中,还有海门、圭屿、浯屿、钱屿、木屿等小岛,这些小岛都成了走私者跟官方周旋的腹地,走私船回还之时,他们一般先停泊金门、大小担,再经线人“诡秘”地“接引”入月港卸货,巧妙地躲过官府的严查。嵩屿、长屿、渐尾、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在官府的文册中被称为“贼澳”,常常令官兵束手无策。

正德年间,佛郎机人来到了中国沿海,开始了与中国海商的贸易联系,尽管明朝政府认识到佛郎机人已经占据了满刺加,且驱逐了当地的统治者,因而拒绝给予佛郎机人的通商要求,但自正德十三年(1518)之后,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浯屿这个贸易基地

林希元(1482—1567)是一名闲居在家的金事,在新任浙江巡抚朱纨看来,这就是一个专门跟王朝捣乱的家伙,“每遇上官行

部,则将素所撰诋毁前官传记等文一二册寄览,自谓独持清论,实则明示挟制。守土之官,畏而想强化对沿海民众的编甲管理,规定船只下海必须当日回来,并推行连坐制度,但是,民众总是能找到官方控制的薄弱环节,甚至有胆大到不但私自下海,而且敢在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当地国王的。更可叹的是行走于海上波海之间的船夫们都依托着或有钱或有势的豪门巨室。面对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许多势官宦富把持不住,有的甚至愿舍官而从商。当然也有矢志忠君者如张绅在奉调两江顺道回家时阻止族人私造巨舶冒禁下海的,他责令族人将造好的大船付之一炬,张绅的行为赢得了官府的夸赞,却从此阻断了自己返乡的路。

月港开港,海澄立县,任职于该地的官员多能从小民的生计着眼,税负轻缓,小民乐于呼应,双方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局面,成为月港社会安宁、人民乐业的重要前提,月港成为“天子之南库”,隆庆开海是明朝政府对原有海禁政策的修正,福建地方官员在舶税征收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得舶税征收平稳有效地运行。

但万历二十七年(1599),中贵人高梁入闽人税监,竭尽苛索之能事,激起了福建当地人的强烈反抗。月港贩海东西洋带给当地社会经济诸多变化,附近居民通过申请船引的方式,以合法的手段走出国门,贩海经商,往来东西洋。月港土特产、江南地区的丝绸物品成为月港商人连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基本媒介,交易换回的各国银币流通在月港周边的市场上,商人不仅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且也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正当诉求,也敢于与葡萄牙人的贪婪之吏作坚决的斗争。总体而言,福建各级官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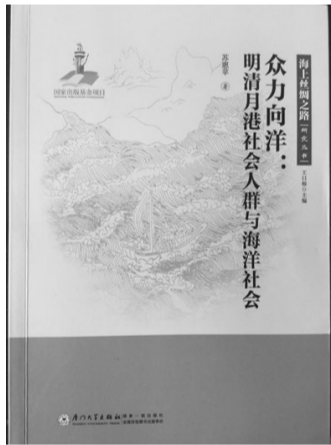
方绅士和普通商民都在推动月港海洋经济和谐、平稳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崇祯年间,郑芝龙受抚,成为大明总兵,控制了东南沿海,至其子郑成功时,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政权,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在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老百姓或“犯禁”,或“顺应”,或“游离”,犯禁时生命和财产常遭毁弃,顺应时则由海上转移到陆上农业,有的则“从戎”,变身为朝廷的军兵,游离则往往流落海外,成为华侨。

三、摇摆的海洋政策使海洋社会时常分裂而存

进入清朝,虽然“禁”与“开”仍多有摇摆,但总的趋势呈现出开的倾向,一旦政权的威胁被缓和,开的呼声就较易成为现实。台湾被清朝纳入行政管理之后,福建商民利用对渡政策,加强了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且多形成福建——台湾——中国沿海港口——日本——韩国等交错的贸易航线,使东亚海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随着沿海地区粮荒的加剧,这种贸易更得到朝廷的默许乃至支持,越加往南洋地区延伸。闽南当地居民加入到这个阵营中,不少定居当地,使侨民队伍进一步壮大。

这些出洋的国人绝大多数都有衣锦还乡的夙愿,他们慷慨地将海外赚取的利润用于在闽南创办实业,开启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投资教育,着力提高家乡的文化素质;兴办家乡的公共设施,便利乡民生活。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到鼓浪屿一跃成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华侨们将他们的视野所及与家乡建筑传统相互结合,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各具特色的建筑样板;我们不难看出到集美



《众力向洋：明清月港社会人群与海洋社会》,苏惠萍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定价54.00元

学村那鳞次栉比的中西结合的辉煌的校舍;我们还不难看到遍布闽南城乡的中西结合的医院、教堂乃至幼稚园养老院等。

月港周围人群生存环境是怎么样的?农业经营者会说:土地贫瘠,难以为生;渔业经营者会说:羹鱼虾蚌,聊以为生;或是商业经营者则说:造船远航,将金银满仓。面对统治者的不同政策和周围环境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月港地区的人们曾不断顺应环境,反复调整自己的生计模式,这其中既有围海造田,有跨海远航,也有为匪贼的,为海盗的。仅就循规蹈矩者而言,他们或在政策允许时经商,在政策禁止时转而农业或从戎,许多人也努力去应王朝的科举盛典。

然而,无论是禁海,还是开海,月港周围的人们还是勉力繁衍发展,海内和海外两个阵地既可能相互隔绝,也多有被打通的时候,到晚清时期甚至形成了相互支撑发展的局面。月港曾在明朝开禁的政策下走向其繁盛的顶峰,却依然能在禁海政策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或融入到广东、香港、澳门的开放经济圈中,或展足海外,延续闽商走四方的传奇故事。

历史变迁的基因势必得到传承。